

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论任弼时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

2006-9-20 张景荣 阅读511次

任弼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曾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以及他对这种精神的始终坚持和贯彻，对体现这种精神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的支持和拥护，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重要内容。

一、任弼时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成立的，受到俄国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巨大影响。在党成立初期及以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化成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口号。这个口号，从理论层面，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像俄国共产党一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从经验层面，就是要学习俄国共产党的经验，来不断增强党的力量。这也反映在当时青年团的建设中。任弼时1925年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精神撰写的《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开头即指出：“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提出‘少年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今年本团第三次大会亦提出‘学习列宁主义’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形式虽不同，然其实质则一。本团的决议就说，本团以后的发展应仿效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精神，学习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经验，按照列宁指示我们斗争方法的原则，以扩张增加我们进攻的实力。”

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下，还有一个怎样布尔什维克化，即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习俄国共产党经验的问题。任弼时认为：“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并不是使团员大家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新名词，或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也不是要团员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如果只以这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那就容易使我们团体变成学院式的组织，或是不落实际而与群众隔离的团体了。倘若这样，不独不能接近群众而为群众的利益奋斗，反足为群众自觉与奋斗的障碍。”正是针对一些人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停留在只是使大家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新名词，或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以及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的情况，任弼时鲜明地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这个重大问题。他指出：“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

任弼时在这里讲了三。第一点，要使团体能群众化，就是要明确布尔什维克的党与团把接近与引导群众的工作，视为达到目的的根本条件，所以它在组织上务求其能与群众接近。第二点，提出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就是警告一般忽视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指出有许多同志常常以为自己对于主义是很明白的，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便做出许多违反主义的行为或发表许多违反主义的理论；或者他们平常研究主义，只顾皮毛，并没有了解内容的真义。而只有求主义上正确的认识，免除过“左”过右及妥协的倾向，如此方可以代表群众，为群众的领导者。第三点，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是说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要避免不按实际情形做事的弊病，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

任弼时在这里讲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与后来毛泽东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强调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任弼时在这里讲的第一点是党和团的组织建设方面的问题，即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似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回事情，但实际上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当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解读这段论述时，可以说，任弼时在这里突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在中国达到革命的目的；二是密切联系群众、用正确的理论引导群众则是达到革命目的的根本条件。所以，我们要“改良组织，务求其能接近群众”，任弼时将其视为“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一步工作”。从任弼时在这里的论述来看，他讲布尔什维克真精神的第二、三两点，实际上都与第一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我们之所以要求主义上正确的认识，免除过“左”过右的倾向，是因为唯“如此方可以代表群众，为群众的领导者”。而我们在针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反对的宣传（即争夺群众、引导群众）时，“要求反对之有力量，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也可以说，第一点实际是第二、三两点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密切联系群众，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后来，任弼时对此有更深刻的论述，本文第二部分会讲到这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探讨任弼时所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时，能否作这样一个概括，即任弼时在这里实质是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以科学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自己，引导群众，实现革命的目的。应该说，在我们党建党的初期，任弼时能提出这样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对“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的始终的坚持和贯彻

任弼时不仅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而且在毕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坚持和贯彻这种精神。例如，他始终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常强调“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指出“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就化为乌有”，“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必须挤时间学习”。同时，他又强调，“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就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他在自己负责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与各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如王明先是“左”倾冒险主义、后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对自己在苏维埃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多次作了坦诚而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批评，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崇高品质。1944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演讲《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中分析了边区财政经济工作中偏右偏“左”的两种倾向，指出“只有克服了偏右的依赖观点，才能够保障我们采取主动的独立的政策来进行对外的经济斗争，而使我们获得胜利。也只有克服偏‘左’的盲目乐观的思想，才能认真去认识经济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才更能够加速边区经济的发展，更加增强我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

而且，他始终把握着与群众的联系问题和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问题的内在统一，强调它们的不可分割。在延安时期，他说过：“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这种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这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1950年10月21日他在《纪念〈中国青年〉创刊二十七周年》一文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结合实际、联系群众并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青年刊物，在团结教育中国青年一代的历史事业上，能够发挥很大的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就在此后数日，即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早逝。可以说，在任弼时的革命生涯中，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先进分子、引导群众，也就是坚持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三、支持和拥护体现“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的杰出代表毛泽东，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确立和

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到,当年王明曾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口号下,将马列主义当成教条,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先是搞了“左”倾冒险主义,而后又搞了右倾投降主义,无论对党的建设还是对中国革命事业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充分说明,任弼时当年郑重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的确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任弼时对这种真精神的坚持和贯彻,不仅表现在自己的身体力行,更表现在他对体现这种真精神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的支持和拥护。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力排众议,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作出了贡献。后来在中央苏区,他又一次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给毛泽东以支持。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弼时的赞助,我和总司令是相当困难的。”在长征中,任弼时抵制了张国焘控制二方面军的图谋,并最终促使其北上与中央会合,从而加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1938年3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弼时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了两次报告,即书面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以及口头说明与补充。他拜会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又多次拜会斯大林,并连续与莫洛托夫、曼努伊尔斯基等共产国际领导人会谈,还广泛接触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志。他反复讲到的一点是,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正确,已经完全被中国革命所证明,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通过任弼时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决议案》,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赞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抗日民族战争的路线、方针和策略。7月6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第一次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全景照片。随后,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离任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他的继任者任弼时的时候,严肃指出:“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这对后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和基本确立起了关键作用。

任弼时留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经常撰写介绍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文章,在《共产国际》、《真理报》、《红星报》上发表。他还翻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印成外文单行本,向国外发行。

任弼时于1940年3月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回到延安,即留在中央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期间,他参与了两件大事,一是协助毛泽东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二是协助毛泽东筹备党的七大,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作出了历史贡献。

在整风学习这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中,无论是组织管理、理论探讨还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的过程中,任弼时始终全力协助、支持毛泽东。他指出,全党同志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及党的决定。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今天在整风学习中,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要努力学会掌握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纠正自己‘三风’不正的一切缺点,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团结,使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我们便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强调:“必须认识,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一切党的正确决定都有马列主义理论。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任弼时还协助毛泽东为筹备党的七大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同志指出:“任弼时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为把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七大路线的重要贡献者。”任弼时

1945年4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奋斗了二十四年，到今天已经成为这样巨大的力量，要依靠它来决定中国的命运。这表现了二十四年奋斗当中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果，终于在党的七大确立了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而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形成、确立及发展，也凝聚着任弼时的重要贡献。

张景荣，天津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4期

网站编辑：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